

划分“右”派: 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

○曹树基¹, 李楠²

(1 上海交通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240

2 香港科技大学 社会学部, 香港)

〔摘要〕建国初期,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但是迄今为止, 关于这场运动中右派是如何划分的仍然存在疑惑。尽管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为右派的划分制定标准, 但在基层的运动中却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两个问题被提出: 一是右派、右倾、严重右倾有何差异? 二是如何将其区分定性? 本文以基层反右历史档案材料为依据, 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 对上述问题给予分析与讨论。研究发现, 在鸣放过程中人们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批评, 对以往政治运动的指责, 以及在鸣放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方式和情绪成为划分右派的标准, 而这些标准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右派”右的差异。

〔关键词〕反右运动; 右派; 阶级斗争

一、问题及相关资料

在一篇相关论文中, 我们讨论了 1957-1958 年间中国基层政区的整风与反右。^{〔1〕} 本文继续追问, 区分“右”派的标准是怎样确定, 而区分他们的过程又是怎样展开的。虽然在 1958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中央下达过一份《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然而, 这份文件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 无法具体操作。本文以 1962 年桐柏县反右档案为中心, 对划分标准和具体过程进行说明。

本文依据的主要资料是 1962 年 5 月至 10 月间形成的 72 份《中共桐柏县委关于对右派及右倾错误人员的甄别结论》(以下简称《甄别结论》)。^{〔2〕} 在这 72 人中, 有 5 名“右倾”分子、36 名“严重右倾”分子和 31 名“右派”分子。众所周知,

作者简介: 曹树基 (1956—),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 李楠 (1980—),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从“右倾”到“严重右倾”，再到“右派”，“错误”或“罪行”的程度是依次上升的。这就留下两个疑问，其一，是否真的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其二，这些差异究竟是如何划分的？

这 72 名“右”派分子，究竟是哪一次运动中的受害者或失败者呢？在桐柏县，从 1957 年至 1959 年，至少开展过以下几次较大的政治运动。1957 年年底的“整风”运动、1958 年初的“反右”斗争、1958 年年中的“向党交心”运动、1958 年 8 月开始的“反右倾”（反倾向）运动和 1959 年 11 月份开始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1957 年年底的整风与 1958 年初的反右，可以看作一个运动的两个阶段，文献中也常常称为“鸣放”、“整风鸣放”或“整风反右”。对此，笔者已有专文探讨，此不赘言。1958 年年中的“向党交心”，前文也有涉及，但讨论的空间仍然很大。1959 年的反右倾，留待将来撰写专文。与本文最有关联者，实为 1958 年 8 月开始的“反右倾”运动。

1958 年的“反右倾”运动，其实是中共河南省委批判潘、杨、王运动的扩大版。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反对大跃进和浮夸风，被省委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8 年 8 月 18 日，中共桐柏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共河南省委第九次扩大会议的有关精神后，在全县开展批判潘、杨、王活动。^[3]1962 年 6 月，中共中央为潘、杨、王三人平反。由于所引桐柏县的这份《甄别结论》形成时间是 1962 年 5 月 30 日，使人推测这份文件可能也是反右倾运动的副产品。

确实，这 72 名“右”派的划分时间集中在 1958 年 11 月和 12 月，以及 1959 年 2 月至 3 月间，而不是反右运动结束后的 1958 年 4 月。虽然其中 1 名右派的划分时间为 1958 年 2 月，却有可能是 12 月之误。也就是说，这批“右”派是 1957 年底至 1958 年初的“整风反右”结束以后的新产品。

从甄别材料的内容看，在“右倾”或“严重右倾”的言论中，只有 14 人的言论时间可以确定，其中，1957 年底 - 1958 年初发表“错误”言论的共有 13 人，1958 年夏秋发表“错误”言论的共有 5 人，其中 4 人既在前一次运动中有过“错误”言论，本次运动再发新论，只有 1 人属于新科。也就是说，共有 9 人纯因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言论而在“反右倾”中获罪。在 31 名“右派”中，有 24 人的言论时间是可以判定，其中 21 人在“整风反右”中有过前科，其中又有 9 人在“反右倾”中继续发言。在“整风反右”中没有纪录，仅在“反右倾”中发表言论的只有 3 人，也属于新科。如此算来，“右派”中共有 12 人因其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言论而在“反右倾”中获罪。

总之，在可以确定言论时间的 38 名“右”派分子中，共有 21 人纯因他们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言论而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罪，有 9 人因为他们在前一次运动中已有“错误”言论，本次运动再次发表新的“错误”言论而定罪，据此可以推测，“反右倾”运动主要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延续，而不是一场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说，《甄别结论》中的“右”派分子虽然是在“反右倾”运动结束后划分的，

但其性质却是对“整风反右”运动的补充与完善。

这份《甄别结论》在进行“右”派分子的甄别时,会逐条列举他们的“反动”或“错误”言论,再作出否定的分析或其他性质的分析。藉此我们可以观察“右派”或“右倾”分子在“整风鸣放”或“反右倾”运动中的言论,以及中共桐柏县委对于他们基本政治观点的判断及改正后的再判断。需要说明的是,桐柏县档案中还有一份类似的档案,其对象主要是县直机关干部中的“右派”,只是因其甄别说明过于简单,^[4]无法利用,故不加分析。对于《甄别结论》中语焉不详的 14 人,也作同样处理。

《甄别结论》中的 31 名右派分子并不是桐柏县右派的全部,还有一批数量多达数百人的右派的改正要等到 1979 年之后。因此,在 1962 年的“改正右派”之上,还存在一个“未改正右派”。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透过各个“右”派的阶层分析,探讨他们何以会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力量。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有时简称他们为“右”派。本文题目得名即来源于此。

二、个案分析:“右”派似乎无差别

1 “右倾”

在全部的 5 个“右倾”分子中,江河小学教员徐生久可以算是最无辜的。他之所以被定为右倾,开除团籍,是因为他给国务院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认为国家工作干部薪金差别大,有的高到几百元,有的低到一、二十元,有的用不尽花不完,喝酒、吃肉、吃点心,戴手表,穿好的,而有的确吃不上,终于还是打饥荒,虽说有救济费,也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国务院应酌情调整,使所有的工作人员积极热情安心工作。”随便站在什么立场上看,这份大字报中所提的意见是没有问题的。县委的甄别意见称此“属于建议,不属错误”。我相信,如果这建议不是写给国务院的,或不用大字报的形式,徐生久应该平安无事。

吴城小学教员杨延顺也可能是最倒霉的一个。他的全部罪过,只在于他在整风鸣放中说了一句普通得再也不能更普通的话:“毛主席的经好,就是叫下面的和尚念瞎了。”在反右倾时,他又说了另一句:“王守庆,善于拍马献功。”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右倾和团内警告。在 1962 年的甄别中,县委结论,第一条“属于个人认识,不能作为划右倾的依据”,第二条“不属错误”。

第二条结论的意思当然清楚,但第一条“属于个人认识”则让人疑惑,在我看来,所有的鸣放言论都属于“个人认识”,如果以个人认识为由,脱逃政治惩罚,那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右派或右倾。在这一例中,杨延顺是因“整风鸣放”中的言论而在“反右倾”运动后定罪的。

城关小学副教导主任曲如清,他的“错误”是除了批评学校的教学质量差以外,还将城关小学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县教育局的瞎指挥。县委甄别材料中称此为“反映实际情况”,是正确的。此外,他写了一张题名为“为一些干部子弟申冤——寄县人委、县委会”的大字报上,批评学校里的干部小孩“顽劣”,是“受机

关下流风气”的影响。仅从题目上看,此文构思怪异,正话反说。他还在一次座谈会上将某县长的通讯员,比做“过去的腿子”,相当尖刻。除此之外,他还在知识分子改造以及国际问题发表一些不算大错,也不正确的言论,因此而划为“右倾”,并撤销行政职务。

杉木桥小学教员李云生的情况则与上述三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公然反对合作社与集体化,其结论材料称:

在整风鸣放时,李云生同志说:“高级合作社不如初级合作社,初级合作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打粮食多。”“过去巴结保长,现在巴结社干。上级是活爷,下级是小,逐级上报。”认识是错误的,但在整风后,作过检讨,不作处理依据。

对照鸣放材料,李云生在鸣放中说的是“互助组不如单干户生活好”,^[5]到了这里,改为“互助组不如单干户打粮食多”。这一看起来无足轻重的改动,实际上是减轻了李云生之罪责。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在“整风反右”中,李云生曾一度列入右派名单,但却最终逃脱,原因不明,或许这一轻微的改动与此有关。

高埠小学教员范玉恒,其定为右倾的理由要比李云生多几条,县委有关结论如下:

在鸣放的时候说:“合作社就是不好,要知道我家入社,说啥也不叫入。”又说:“八路军两套手挽(腕),入社时动员说作好,作好,可是不照样作。”在一张大字报上写道:“统购统销不结合实际,到春上二、三月间社员没吃的等。”57年10月在学校引用群众的话说:“我认为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单干户就是随便,有吃的。”此条是反映本村实际情况,也有部分属于个人认识,不属错误。

在讨论会上说:“党能领导学校,但具体到社,党员有困难,只能领导政治,不能领导业务。”属于自己认识,不属错误。

有李云龙之案例在先,加上每个个案又有案主对于事实的确认——同意或部分不同意,因此,对于范玉恒的上述言论是无庸怀疑的。如果上纲上线,范氏对于合作社集体化的不满,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满,以及对于外行领导内行的不满,足以使他划为“右派”而不是“右倾”。这五个案例让我们深感困惑,既然存在差异如此巨大的“右倾”,他们与“严重右倾”和“右派”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2 “严重右倾”

在全部36名划分为“严重右倾”的人员中,有10人的平反甄别没有说明具体理由,故略而不述。有1位的甄别结论称,1958年9月份他“在平时和同志个别交谈,谈出的思想认识,属于正常的民主生活范围,不应作为严重右倾的依据”,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这点看,我相信这位张姓“严重右倾”分子,在私下与同事的交谈中,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一定有极大的不满,而听者恐惧,向党

汇报,酿成大祸。

在其他 25 位值得讨论的名单中,有一批划为“严重右倾”者的错误言论,其实并不严重。例如,张庄小学教员姚义武,1959年 3 月 25 日定为严重右倾,并受团内警告。“现经查对原定姚义武同志的右倾材料是合作化问题,是反映本村的一些实际情况,没有错误”。类似的错误,在上述 5 个“右倾”分子中,至少有 2 人。何以姚义武划为“严重右倾”而不是“右倾”,不得而知。

有一些问题现在看起来是相当无聊的。如毛集熊家砦小学教员田长青说:“婚姻法还不好,不应叫年令〔龄〕大的男的和年令〔龄〕小的女的结婚”,“新式双铧犁群众放着不用”,都“属于平时发表的个人意见”,被同事密报后才成为罪行。他对县教育科的意见是:“教育科的政治方向转了舵,提拔的大部分是地富出身的人”,应当划其为“严重左倾”而不是“严重右倾”。

当再读到月河小学教员刘士奇的以下言论时,笔者有了新的想法。刘说:“文教科象大教主下凡一样,啥人都信。”我开始相信,严重右倾的初步划分是由各个主管部门完成的,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所有对于教育科的批评,都可能招来“右倾”之祸。至此,我开始理解几乎所有对于桐柏教学质量的批评,都成为划分“右倾”的依据。更何况,在刘的批评中,还有一句“党委对农村教育界教师不重视”。如欲不信,请再看城关小学教员曲范忠 1958 年元月的鸣放:“团县委发展团员求量不求质,王万江的工作落后,范局长丢枪……教育科在提拔干部上有官僚主义”。批评的落脚点仍然在县教育科。

其他一些“严重右倾”言论,实在令你想像不出,究竟有多么“严重”。固县小学教员耿德仓称:“三中领导官僚”、“水利局无计划”、“一中教学有资产阶级观点”,甄别意见均认为是正确的。毛集公社扫盲专干王修楚称“赵建华书记倚老卖老”、“李区长工作拖拉”、“毛集公社党委会对扫盲不重视”,无任何实质意义。刘新店小学教导主任赵星增认为“教学质量低”、“有以人代畜”、“民选有些不民主”、“三中校长官僚”,在甄别结论中定性为“均属于反映实际情况”。只有“以人代畜”一句,批评的是农村畜力损失多,有变相攻击合作化之嫌。

由此而断定所谓“右倾”与“严重右倾”的差别不存在,可能过于轻率。因为在“严重右倾”分子的言论中,一些被视为攻击性言论才是他们罹难之祸因。

棉桥小学教导主任郑承瑞,在一张题名为“何科长的大事业”的大字报中说,何科长的工作痹塌,态度不好,直接批评教育科的部门领导,更要紧的是,他提出:“粮食 360 斤不够吃”,则是触及到了时政之要害。至少从 1957 年开始,桐柏县实施人均每年定量 360 斤原粮食的政策,折成成品粮食,每人每天只有 7.5 两。饥饿以及对于饥饿的抗议成为桐柏民意之主流,也成为“右”派折腰之所在。

毛集小学教员易明耀批评的是县教育科的另一位许科长,替某人找了代课工作,很快转正。在今天看来,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但也不算不得什么大事。接着他说:“粮食指标低,(每月)30 斤不够吃。”直接对粮食政策提出批评。不仅

如此，他还进一步发挥：“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差，工业品价高，农业品价低。”矛头直指基本面。郑承瑞和易明耀的意见发表时间不详，从言论的性质看，似乎是在“整风鸣放”中出笼的。

新集小学教员张汉东一共有七条右倾言论，《甄别结论》没有一一列举，只说：“第一、二、四、七条，是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思想谈的错误认识，不应作为处理依据。第六个问题是在右派分子谢国华写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本人不负主要责任。”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张汉东写了一张题名为“党有偏向”的一张大字报，其内容是：“党对工人、农民、干部与教师对待不一样。”如果仅仅指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人“对工人、农民、干部与教师对待不一样”，或许还要好一些，但张批评的是“党”，性质就不一样了。所以，《甄别结论》说：“里面也反映一些实际问题，也有不全面的看法。”虽然平反，却有所保留。我推测第三条意见和第六条罪行，都是在整风鸣放中提出或犯下的，如果没有“反右倾”运动中新加的四条言论，张汉东可能逃脱了这一厄运。

月河小学教员赵国增与其类似。整风鸣放时，他在一张题为“县委的威权”之大字报上签了字，从题目上看，这份大字报是直接对准中共桐柏县委的。他还说：“农民留粮标准少了点”，再加上“党中央不根据具体情况乱打井，无计划造水库，造成了浪费”一句，足以使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吴城龙王庙小学教员李修亭在整风鸣放中曾以“桐柏转设治疗三害医院”为题画了一幅漫画，其具体内容并不知详，向领导提意见则无疑问。《甄别结论》认为所提意见无错误，却让我想到采用漫画的方式，可能令被批评者很不愉快。不仅如此，他还说：“党能领导学校，但没有文化的党员不能领导学校。”严格一点，仅凭这一言论，就完全可以划为右派了。

侥幸逃过“整风反右”运动的李修亭对此并无深刻认识，在“反右倾”运动中，他居然公开赞成潘、杨、王的观点：“我认为关于自留地问题和开的荒地粮食不计免购点很符合我的心意，这对改善社员生活和支援国家建设都有好处。现在自留地的收入又归社里了，对政府有惑疑。”“桐柏走社会主义有困难，不能用拖拉机”；“转社后，庄稼没有过去自家耕长的好”。还说：“入食堂后太死劲，伙食也差的很。”“食堂优越是肯定的，但社支书向上假汇报，报的多的，社员没啥吃，群众不满意。”最后，李氏干脆公开自己对于阶级以及中国政治的整体思考：“地主通过改造，可以改变成份。不管几类地主子弟应该收，不过入学后要加强教育。”“地主子弟各方面都好，也可以当干部”；“我认为通过肃反、镇反，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我认为都是人民内部人，敌我斗争就是不多了。”他的这一相当出格的言论，得到的甄别意见居然是：“言论正确，无错误”，令人惊讶。

现在我们知道，1962年中国政治上的短暂宽松，是以前三年间数千万死亡者的生命作为代价的。至1963年，阶级斗争的理论重新泛起，农村再次成为“阶级斗争”之主战场。也就是说，再过一年，李修亭的严重右倾要得到甄别平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从这点上来看，他真是不幸中的幸运者。

李修亭案给我们带来的困惑是,如此出格的言论还仅仅是“严重右倾”,那么,什么是“右派”呢?“严重右倾”与“右派”之间还会有区别吗?

3 “右派”

在值得评论的 28 份“右派”甄别材料中,“错误”性质最轻的,可能是金桥小学教员郑承杰。在整风鸣放时,他画了一张漫画,向黄家生提意见。在写一张大字报时,将“站稳立场,声讨右派”误写为“声讨左派”。据《甄别结论》。郑氏“实际当时写的是声讨右派,因笔迹不清,误认为是声讨左派,不属错误”。郑氏获罪,似乎比窦娥还要冤。

县商业局办事员李立黄有关错误言论也令人费解。李说:“工会工会,光收会费,会员的福利与教育放弃”,《甄别结论》说这是大鸣大放中即“整风反右”中提的合理意见。我无论如何想不出,定罪时,这条意见是如何被当权者评估的。作为李立黄的第二条罪行,是他在鸣放中说:“人不贴我,我不贴人,有人贴我一,我还贴人二。”所谓“贴”,指贴大字报,表明自己对于提意见者有反提意见的勇气与决心,甄别中定为“不属于错误”。最严重的一条,则是在 1958 年反倾向运动中:“河南省委老实,把河南缺粮省变为余粮省,欺骗了中央,也给中央献了好。”这一意见可能与潘复生的观点基本吻合,于是划为右派。依我的观点,应当划为“右倾”或“严重右倾”才更加合适。

鸿仪河小学教员张国支曾经表示,“支持报纸上右派分子的言论”,《甄别结论》认为这“属于个人问题,不作处理依据”,也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这一条推而广之,

1958 年 4 月划定的右派中,有一批皆可援例平反。张国支的言论还有:“冰棒里乍能敲出温情来,共产党员使人可敬而远之。”“粮食供应死劲,同情支持潘复生自留地问题”,“肃反不应确定重点人”。这些在《甄别结论》中,都定为正确的意见。至于张在写大字报时,把“兴无灭资”写成“兴资灭无”,也被解释为/笔下之误,不作处理依据。1962 年中国政治的短暂宽松,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且目睹过多起类似悲剧的笔者,不由感叹再三。

我相信,张国支的情况与李立黄类似,如果没有/反右倾运动中对于潘复生政策的公开支持,整风鸣放中的问题,也就被忽略而被遗忘。/反右倾的结果之一,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张和李,于是便成为前仆后继的牺牲者。

其实,这批右派的最过激言论,还是与农民生活有关。平氏小学教员施晓拯说:/合作化后农村经济死滞, /教师粮食不够吃, /农村粮食 360 斤不够吃,农民饿得脖子伸多长, 5 甄别结论 6 称 /是反映的实际情况,但言词不当。这令我联想起一批类似的案件,同样的意见,如果采用形象化的生动表达,就会与/尖刻一词联系起来,错误的性质就会变化,划/右的机率就会增加。

水湖流小学副教导主任阮一卜,其/错误要追溯到他在 1957 年 12 月份所鸣放的干部政策问题,以及 1958 年元月所鸣放的关于粮食政策方面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引用社会上的谣言来说明工作中存在有缺点, 5 甄别结论 6 虽

) 186)

然说明是什么谣言,但完全可以想像,民间谣言的形象化与用词之尖锐。不仅如此,在 1958 年元月,他曾写过一份以 / 诊断书 0 为题的大字报,5 甄别结论 6 称: / 其内容是提意见性质,在认识上有些偏面,方法不当,但不属错误。0 从题名本身上,阮已经可以划入尖刻的批评者之列了。

毛集区团委副书记李荣华在整风鸣放中用漫画画 / 原县委副书记孙文华同志是陈士美思想 0。其他如他在大字报提出, / 县委不处理公安局长范杰峰打老婆是官官相卫 0,以及反映 1958 年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以及在同年 8 月反倾向时说: / 潘复生说农民生活苦,现在不如过去。0 都不如漫画批评给人印象深刻。在 1958 年 9 月份下乡回来对人说: / 大李弯队正搞澄清粮食,两天没烧锅 0,时值桐柏县饥荒严重的时刻。这一问题的提出,触到了桐柏县委的要害之处。当然,如果没有 1958 年夏天的一系列言论,一幅批评县委副书记的漫画还不至于置他于死地。

固庙小学教员叶大相问题与此类似。在一份大字报中,他批评工资评定不合理,偏差很严重,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话说到这里本该结束,他却要妙笔生花: / 只要领导放下一点官僚架子,睁开一线之光的官僚眼睛,不合理的工作问题就会如山似海的在你的眼前,倘若仍熟视无睹,公平合理将要变成一只雄鹰啄掉你们的眼睛。0

当然叶大相还有其他更为猛烈的批评,如他说: / 统购统销 53 年搞的问题很大,有些户家中没那么多粮食,硬逼着叫卖,这样搞的有不少的透底现象,群众也不敢反映。每年春上,有很多人逃到湖北去。0 又说: / 我们的学校中,没有广泛的民主,集中是专权的集中。0 如他说中国共产党 / 今天成了执政的党,干部也以人民的老爷自居,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给党造下了损失,今后必须扭转 0 等等。再如他说: / 潘复生的指示命令,省委委员能会不知道,有一定的责任。0 表明整风鸣放以后,他似乎没有太多的收敛,于是厄运就降临了。

在另一篇论文中,我曾列举桐柏一中教员赵克文的言论,是他在 1958 年暑假后,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 / 右派分子说党天下,青一色,是偏激情绪。0 还说: / 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是本质决定,我们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敢。0 又说: / 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反击右派,这是互相攻击。0 5 甄别结论 6 称此: / 均属平时课堂讲课,不作为依据。0 甄别结果很令人不可思议。1962 年的中国政治,到底怎么了?

总之,据上述分析,在不同层次的三个 / 右 0 派等级中,似乎都存在一批 / 错误 0 程度相当低的案主,也又都存在一批 / 错误 0 性质相当严重的案主。如果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似乎无法回答上文中提出的问题: / 右倾 0 / 严重右倾 0 和 / 右派 0 到底有什么差别? 如是有的话,主事者是依据什么标准进行相互区隔的? 三者之间无差别的假设不符合笔者的生活经验,笔者因此而怀疑这一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因此,本文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分析方法。

三、数量分析：/右0派之间有差别

在进行个案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已经注意到，/右0派分子的批评言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民生活与农民地位：农民生活苦，每人每年 360斤原粮不够吃；农民地位低，不如工人等；

其二，合作化与农村经济：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农村经济死滞等；

其三，农村教育：教学质量差，农村教师地位低，教育科或党不重视农村教育等；

其四，党政关系：以党代政，党有权，政无权，外行党员领导内行等；

其五，干部政策与干群关系：党员提拔快；领导亲属好提拔，党员高人一等；

其六，历次政治运动：对肃反不满；对反右不满，同情或支持右派，在右派写的大字报上签名；同情或支持潘复生等；

其七，批评领导：部门或县委；省委、国务院或/党0。

甄别结论6的行文格式，有时会将/右0派们的言论分为几条，且引用/右0派们的原话，每一句话分别用引号标出。在一般情况下，一条即为一项。有时所引的右派言论中，一句话有明显不同的两层意思，如夏善宝的一句话中，前半截批评统购统销，后半句认为不应向前苏联学习五年一贯制，批评的内容有明显的不同，计为两项。据此，笔者在附表中将/右0派言论的每一项计为1分，逐个进行统计。很显然，批评的意见越多，得分越多，/右0的性质也就越严重。为了行文的简洁，在附表的统计中，本文对农民生活与农村经济这两栏进行合并，党政、人事两栏也进行合并。

不同类型的意见，其/错误0的程度是否有所不同，并最终影响到其定罪？本文的结论是肯定的。之所以不在统计中对/右0派言论进行加权分析，是为了保持统计的原貌，以免引起误解。有些言论，我们今天认为不是错误的，在当年却是定罪的依据。如徐生久说自己超令要退团，由于5甄别结论6中仍然列为要平反的条目，统计中列入/其他0项中。另有一普遍性的说法：/团组织发展团员求量不求质0，则记入/批评部门县委栏0，分别计为1分。另外，如果原资料中出现在批评农村经济停滞的同时，同一句又批评共产党应该对此负责，统计中则记入批评共产党的栏目下。本文统计，皆依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笔者还强烈地感觉到，在划分/右0派的过程中，案主所用语言的性质也是其/错误0性质判定的根据之一，甚至是主要根据之一。由此，笔者也将/右0派言论表达的方式，即/情绪化语言0作为一个统计项。本文将/情绪化语言0分为/强度语言0和/形象语言0。所谓/强度语言0，如/右派0/安阜斌说：/农民生活苦，群众要起来打偏（扁）担，我也跟着要造反。0/造反0一词，就是强度语言，有暴力倾向。另有几名因将/右0误写为/左0，或被人误读为/左0，或者在游行中

喊错口号,且因其成为定罪依据,皆算作 / 强度 0 语言。在这一分析中, / 强度 0 并不以是否真实为准,而是以是否成为实际定罪依据为准。所谓 / 形象语言 0,如 / 右倾 0 杨延顺说: / 毛主席的经好,就是叫下面的和尚念瞎了。0 将伟大领袖作了类似 / 佛 0 的比喻,是为大不敬, / 右倾 0 分子李云生说: / 上级是活爷,下级是小 0,言语刻薄,丑化上级领导。语言分析具有加权的性质,它是在原有的批评统计中,另加一新的权重。兹将此 58 名 / 右 0 派分子的言论分类统计如附表。

附表得到 58 名 / 右 0 派不同的 / 错误 0 分值,即所谓 / 错误 0 或 / 罪行 0 程度。例如,5 个 / 右倾 0 分子,得分分别为 2 分、3 分、3 分、4 分和 7 分;其中既有 1 名得 2 分者,也有 1 名得 7 分者。这一 / 罪行 0 之幅宽,不仅与 / 严重右倾 0 分子相似,也与 / 右派 0 分子相似。 / 严重右倾 0 中只有 1 人高于 7 分, / 右派 0 中也只有 4 人高于 7 分。这可能就是在上文进行的个案分析中,很难找到不同类的 / 右 0 派分子之间差异的缘故。

进一步的分组统计,可以使得三类 / 右 0 派言论的差异,体现得更加明显。为了便于比较,表 1 将附表中的 / 党政关系、外行领导内行 0 与 / 干部与干群关系 0 合并为 / 党政人事 0,有结果见表 1。

表 1 桐柏县 / 右 0 派分子言论性质分组分类统计

右别	人 数	涉农 言论	教育 问题	党政 人事	政治 运动	提意见		其他	小计	平均	情绪化语言		合计	平 均
						部门 县委	省及 中央				强度 语言	形象 语言		
右倾	5	3	2	2	0	2	2	3	14	2.8	0	5	19	3.8
严重右倾	25	18	7	6	12	35	7	5	90	3.6	4	9	103	4.1
右派	28	25	5	23	31	23	11	12	130	4.6	12	15	157	5.2
合计	58	46	14	31	43	60	20	20	234	4.0	16	29	279	4.7

资料来源:据附表制作。

据表 1 可知 58 名 / 右 0 派分子,共因 234 条 / 错误 0 言论获罪,共计 234 分。

三类 / 右 0 派平均每人错误言论分别为 2.8 条、3.6 条和 4.6 条。差别明显,且有序增加。从这一指标看,真可称: / 言多必失 0,平均每一 / 右派 0 之言要比 / 严重右倾 0 多出 1 条,要比 / 右倾 0 多出 1.8 条。

加上语言的权重后,58 名 / 右 0 派 / 错误 0 增加为 279 分。 / 右倾 0 平均每人得 3.8 分, / 严重右倾 0 得 4.1 分, / 右派 0 得 5.2 分。很显然, / 右倾 0 与 / 严重右倾 0 的言论之间的差别大大缩小,几乎可以忽略,而 / 严重右倾 0 与 / 右派 0 的差别仍然很大,接近 1 分。其间奥妙,值得细细玩味。

假定少言寡语的 / 右倾 0 们,不给国务院贴大字报,不将毛主席比作 / 佛 0,也不将上级比作 / 活爷 0,当然也不能将教育科说成有 / 奶奶味 0,他们可能就不会被划 / 右倾 0。心平气和地、不带情绪地 / 鸣放 0 或提意见,可能是不会惹事的。在表 1 的统计中,我们居然发现 / 右倾 0 分子们使用形象语言的强度,每人平均为 1 条,超过了 / 严重右倾 0 和 / 右派 0。

表 2 桐柏县 /右 0 派分子各项言论的平均数

右别	人数	涉农 言论	教育 问题	党政 人事	政治 运动	提意见		其 他	情绪化语言	
						部门 县委	省及 中央		强度 语言	形象 语言
右倾	5	0.6	0.4	0.4	0.0	0.4	0.4	0.6	0.0	1.0
严重右倾	25	0.7	0.3	0.2	0.5	1.4	0.3	0.2	0.2	0.4
右派	28	0.9	0.2	0.8	1.1	0.8	0.4	0.4	0.4	0.5

资料来源：据表1制作。

当我们将 /强度语言 0 的平均条数也纳入统计, 就会发现, /右倾 0 们没有使用此类语言, 比较而言, 他们的批评仍是和风细雨式的。 /严重右倾 0 分子平均每人使用了 0 2 条 /强度语言 0, /右派 0 分子则平均每人使用了 0 4 条 /强度语言 0。换言之, /严重右倾 0 分子每 10 人中有 2 人使用了攻击性的语言, 而 /右派 0 分子每 10 人中中使用攻击性语言的多达 4 人。两种语言合而计之, /右倾 0 与 /右派 0 的水平相当, 而 /严重右倾 0 使用情绪化语言的水平明显较低。

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即对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态度, 也可以反映 /右 0 派们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如表 3 所示, /右倾 0 们从来不对政治运动表态, 如果表态, 他们可能划为 /严重右倾 0 或者 /右派 0。 /严重右倾 0 分子每人平均发表 0 5 条对于肃反、反右、反右倾等运动的批评性意见, 或者表达对于反革命或者右派的同情及支持, /右派 0 每人平均发表的此类意见多达 1 1 条。

党政关系、干部政策方面的差异也非常大, /右派 0 的言论主要集中在干部政策与干群关系方面。他们对于党员高高在上, 对于干部提拔中的任人唯亲, 特别看不顺眼, 此类的言论也多。人均 0 8 条, 远远超过其他两个 /右 0 派阶层。另外, 在提意见方面, /严重右倾 0 分子对于本部门领导的意见要比其他两类 /右 0 派多出许多, 这从反面证明, 所谓 /严重右倾 0 的划分, 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提意见中得罪本部门的领导有关。

行文至此, 我们仍未明了究竟哪些因素对于划分 /右派 0 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本文尝试采用采用定量分析的手段, 来对哪些因素对于划分 /右派 0 是重要的进行说明。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把在整个鸣放过程中的发言按照所反映的内容及形式整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这五方面的内容分别为: 一是针对农村生活以及农村经济和合作化的批评; 二是针对教育暨教员们对本行业内业务的看法和意见; 三是针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批评; 四是对上级的批评, 但是正如前所述, 群众的批评不仅仅停留在本部门或者本级行政单位, 有些群众的批评涉及到了省委甚至是党中央, 因此我们有将此项分为两个小方面, 一个是对县委以下部门的批评, 一个是对省委以上部门的批评;¹⁶² 五是批评的语言方式。以上这五方面最终决定了发言者最后在 /反右 0 斗争中, 究竟被划为 /右倾 0 还是 /右派 0。

因此, 我们构建一个 ordinal prob it 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 /右 0 的性质, 而解释变量为鸣放发言中所包含的各项内容,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模型 1 中可以看出, 在所有决定是否是 /右倾 0 还是 /右派 0 的因素

中,除了针对本行业内部问题的批评系数为负外,其余各个解释变量符号均为正,并且有关农村农民问题、以往政治运动的批评以及批评的语言方式这三项统计显著,显著水平均在 5% 以上。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这三个方面对于划分是 / 右倾 0 还是 / 右派 0 是十分重要的,并且从回归系数可知,如果鸣放中包含对历次政治运动进行批评的言论,那么则最容易被划分为 / 右派 0。

表 3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涉农言论批评	0.434	(0.218)**	0.440	(0.219)**
行业内部业务问题	-0.266	(0.441)	-0.301	(0.449)
政治运动	0.466	(0.174)***	0.478	(0.177)***
批评上级(县委以下)	0.108	(0.130)	0.102	(0.130)
批评上级(省委以上)	0.154	(0.276)	0.160	(0.277)
言论方式	0.435	(0.212)**	0.419	(0.211)**
控制变量				
身份虚拟变量(0=群众)			0.196	(0.458)
样本数量	58		58	
LR chi-square	14.41		14.60	
p-value	0.0254		0.0415	
Pseudo R-square	0.1794		0.1817	
likelihood	-32.962		-32.869	

说明: (1)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2) *显著水平10%; **显著水平5%; ***显著水平1%。

由于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似乎发言人的身份容易影响被发言者最终是被划分为 / 右倾 0 还是 / 右派 0,即干部在鸣放中的发言过激似乎要比普通群众更容易影响最后在反右中定性的结果。因此我们将发言者的社会身份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1 中,回归结果如模型 2 所示。从加入社会身份后的回归结果看,原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系数及其显著性稳定,但社会身份变量虽然为正,表明干部更容易被划分为右派,但是统计不显著。这是因为,用于本项研究的材料以中小学教员为主,县直机关干部中的 / 右 0 派平反,见于其他资料。只是由于另一资料中没有详细的定罪言论,所以,无法纳入本文分析。

四、讨论

从最后处罚的结果来看, / 右倾 0 分子多被团内警告、留团察看和开除团籍; / 严重右倾 0 分子所受处罚的程度与此相当,偶有降级降薪者; / 右派 0 分子大多受到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的严厉处罚。处罚结果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也证明 / 右倾 0 与 / 严重右倾 0 之间的差异不大,与 / 右派 0 之间的差异较大。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经验观察基本吻合。

这令我想起在桐柏县档案中所见 / 整风反右 0 中的 / 右派 0,与 1958 年底及 1959 年初划分的右派相比,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由于没有同类的 5 甄别结论 6 可供比较分析,对于此点,尚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明。

从逻辑上思考,1958 年 4 月的右派,要真正成为右派,也必须在三个鸣放栏目上出类拔萃。一是为农民说话,批评合作化,二是批评历次政治运动,三是采

用情绪化语言,包括 /强度语言0和 /形象语言0。由于 1958年 4月的右派是桐柏县的第一批右派,如果他们没有对 1957年夏秋之间的地市级以上反右表态的话,又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肃反运动的话,他们在本栏目上强势表达就有可能不存在。这样一来,所谓 /右派0就主要是那些为农民说话,且语不惊人势不休的鸣放者了。

在县直干部的鸣放中,也有许多批评统购统销,为农民叫苦鸣不平者。在代表农民利益这一层面上,县直干部与中小学教师是否存在差别,因无资料,无法深入研究。在本案 58人中,只有 7人不属于教师。即便是不属于中小学教师的 7人中,也只有 2人的罪行与农民无关,其他 5人的罪行皆涉及农民、农民与合作化。本案案主,无论是中小学教师,还是其他人等,差不多都可以称为农民的代言人。在这一点上,1958年 4月的右派与本案中的 /右0派可能是无差别的。

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将 1957年底至 1958年初整风鸣放中不就事论事的 /概念归纳0作为 /右派0言论与一般鸣放言论相互区别的基本标识。从某种意义上说, /概念归纳0与 /形象语言0属于同一性质。例如,桐柏县的著名右派芦金甫将县人委(政府)与县委的关系,归纳为 /方章圆章,圆章重视0,说的是公章为圆章的县委权力大过政府。又说 /灯下不亮0,说的是县直属乡的工作做得不好。从这点上来说, /整风反右0与 /反右倾0中的划分 /右0派本质上是相同的。以言获罪的要害不完全是批评的本身,而是批评的态度。

实际上,在 /整风鸣放0中,笔者也很少见到本文所称之为 /强势语言0。用此类语言来进行鸣放,与呼喊或书写反动标语没有什么区别。这些据称有如此恶劣言论者,如何能逃脱 /整风反右0,是令人怀疑的。从 5甄别结论 6的记载中推断,正是因为有人对于此类案主有着非常严重的控告,但控告者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所以才会延迟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定案。如果证据确凿,1958年 4月即可定案。在 5甄别结论 6中,不少人的此类罪行,平反时判定为 /抢嘴0 /错写0或 /识别错误0,以及不是本意等。从这一点看, /反右倾0运动之后划出的 /右0派中之相当一部分,其实比其他 /右0派更冤。

这样一来,真正的 /右0派属于那些善于用概括性的、形象化的语言来批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乃至共产党的人。这种语言,可以统称为 /情绪化语言0。中共桐柏县委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此类 /情绪化语言0中所包含的 /情绪0,即是对党的组织、党的方针、党的路线不满的情绪。这种情绪,也就是本文要定义的 /右0派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桐柏县的 /右0派划分,确实划出了一个阶级,一个对中共的组织、方针和路线表示强烈不满的阶级。这个阶级是客观存在的,划分的依据是基本合理的。

需要补充一点,中共桐柏县委在 1958年底和 1959年底划出大批 /右0派分子,其中约 31个 /右派0,89个 /反社会主义分子0,320个 /严重右倾分子0¹⁷²(估计其中包括一批 /右倾0分子)。究竟何为 /反社会主义分子0,值得来日细细推敲。仅从本文关于 /右0派的分析来看,他们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

对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态度,而主要又是对于 /整风反右 0以及 /反右倾 0运动的态度决定的。于是,运动的本身竟然成为运动的目的,即反对运动者成为运动的对象。这一特点,从此成为中国政治运动的常态。

附表: 桐柏县 /右 0派分子言论性质分类统计

姓名	行政等级	涉农言论	教育问题	政治运动	提意见		言论形式	合计
					部门县委	省以上		
右倾								
徐生久	0	0	0	0	1	1	0	2
范玉恒	0	2	0	0	1	0	0	3
杨延顺	0	0	0	0	2	0	1	3
李云生	0	2	0	0	1	0	1	4
曲如清	1	0	1	0	1	0	4	6
小计	4	1	0	6	1	6	18	
严重右倾								
王淑琴	0	1	0	0	1	0	0	2
田长青	0	1	0	0	1	0	0	2
吴梅理	0	0	0	0	1	0	1	2
薛永乾	0	1	0	0	1	0	0	2
王修楚	1	0	0	0	3	0	0	3
耿德仓	0	0	0	0	3	0	0	3
宗启山	0	1	0	0	0	2	0	3
季天增	0	2	0	0	0	0	1	3
郑承瑞	1	1	0	0	1	0	1	3
王群富	0	0	0	0	4	0	0	4
王诗贤	0	1	0	0	2	1	0	4
刘士奇	0	0	2	0	0	0	2	4
刘玉亭	0	3	0	0	1	0	0	4
刘惠民	0	1	1	0	2	0	0	4
曲范忠	0	0	0	0	4	0	0	4
张德松	0	1	0	2	1	0	0	4
赵国增	1	1	0	0	2	1	0	4
赵星增	0	1	1	0	2	0	0	4
易明耀	0	2	0	0	3	0	0	5
孙素亭	3	0	0	0	5	0	0	5
张新立	0	2	0	0	0	3	0	5
陈立斌	1	1	2	0	1	0	1	5
张汉东	0	0	0	5	0	1	0	6
郑昌录	1	0	0	1	4	0	1	6
李修亭	0	1	0	3	3	1	1	9
小计		21	6	11	45	9	8	100
右派								
郑承杰	0	0	0	1	1	0	0	2
刘干	0	0	0	1	0	1	1	3
夏善堂	0	2	0	0	0	1	0	3
徐海亮	0	0	0	1	1	1	0	3
景仙玲	0	0	0	3	0	0	0	3
尹清海	0	1	0	0	1	0	2	4

续表

姓名	行政等级	涉农言论	教育问题	政治运动	提意见		言论形式	合计
					部门县委	省以上		
李立黄	0	2	0	0	1	1	0	4
阮一	1	1	1	0	1	0	1	4
姚义光	0	0	0	1	3	0	0	4
秦启周	0	0	0	0	0	2	2	4
高宏德	0	2	0	1	1	0	0	4
张国支	0	0	0	2	0	1	1	4
郑一民	2	2	0	1	1	0	0	4
王者仁	0	0	0	2	2	0	1	5
安卓斌	0	1	0	1	3	0	0	5
施晓拯	0	3	0	0	1	0	1	5
李荣华	2	2	0	1	2	0	0	5
曾广勋	0	1	1	0	2	0	1	5
魏廷删	0	2	0	1	1	1	0	5
李清华	1	0	0	0	2	1	3	6
雷质明	0	1	1	2	0	2	0	6
张金铭	0	0	0	2	2	0	2	6
张斌	0	4	0	0	2	0	0	6
赵克文	0	0	0	3	3	0	0	6
叶大相	0	1	0	1	3	2	1	8
王国均	0	1	0	1	5	0	1	8
邱汉杰	0	2	0	2	3	1	1	9
黄广华	0	2	0	10	4	0	0	16
小计		30	3	37	45	14	18	147

资料来源:据中共桐柏县委:5关于对右派反右倾错误人员的甄别结论6统计,桐柏县档案馆:3-1-15-368 资料来源:据中共桐柏县委:5关于对右派反右倾错误人员的甄别结论6统计,桐柏县档案馆:3-1-15-368。说明:58名/右0派分子的身份等级依以下标准确定:0级为中小学教员、办事员、营业员、会计和农科所助理;1级为中小学教导主任及副教导主任、教育局及乡扫盲干部;2级为县工业局供销股长和区团委副书记;3级为团县委副书记。

注释:

112曹树基:5阳谋:基层政区中的整风与反右))以桐柏县为中心6,未刊稿。

122中共桐柏县委:5关于对右派反右倾错误人员的甄别结论6,桐柏县档案馆:3-1-15-368

132桐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5桐柏县志#大事记6,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142中共桐柏县委:5关于对有关人员的平反决定6,1962年4)10月。

152中共桐柏县委员会:5关于文教、工商界整风会议大鸣大放的总结简报6,1958年1月14日,桐柏县档案馆:3-1-174。

162之所以这么划分,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程度存在严重差异。作为县级反右前的鸣放对本部门或者是针对本级行政部门的批评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基层县级内的群众把矛头直指省委和党中央,这是不可忽视的举动,因此我们在这里将其进行区别对待。

172桐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5桐柏县志#大事记6,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1责任编辑:公乙2